



邁進新世界—— 專訪聯合書院新任院長余濟美教授



2012年可說是充滿挑戰的一年。先有首次推行的「三三四」學制及隨之而來的雙軌年，然後有多所新書院相繼收生。余濟美教授即於此多變之秋接替已任職院長十年的馮國培教授成為聯合書院的院長。正所謂新人事新氣象，且看看新院長面對重重挑戰的新思維。

對於院長的角色，余教授認為必須要具備國際視野，以面對全球化的挑戰。「書院應與世上最好的書院交流，不獨是兩岸三地。書院於未來會繼續發揮五十多年的基業，與更多海外的院校訂立長期交流計劃。」隨著五所新書院全面收生，余教授認為聯合書院應配合社會發展，加強書院的定位。「香港的天然資源少，人的腦力是香港最大的資源。而書院一直擅於創新，早於數十年前便行風氣之先，率先為大學設立政治與行政學系、電子工程系及生物化學系。另外，書院在環保方面亦甚具創新精神，於2004年便創先河，為張祝珊師生康樂中心安裝太陽能熱水系統，大學亦十分欣賞，其後更仿效書院，於多座宿舍及體育館安裝類似的系統。因此，書院可加強以創新精神，立根香港為定位。」談及書院的未來發展，余教授認為書院的六十周年院慶將會是書院發展的里程碑。他期望通過六十周年院慶為書院帶出新景象，向社會推廣聯合書院於社會發展上扮演的角色。他指出：「開始有很多例子，如新政府中有很多聯合人擔任舉足輕重的角色，可見書院在五十五年來培養了大量人才為社會作出貢獻。我們將會就聯合書院對社會的貢獻，進行系統的整理。」

余教授早於2009年開始於書院擔任通識教育主任，更在2011年出任書院副院長，亦參與了不少學生工作，對書院，對聯合人均十分熟悉。書院在余教授心中更是一個親切的家，人情味濃厚，大家都不分彼此。他亦希望以後能與學生多接觸，向學生表達關切之情。對於書院與大學教育的關係，余教授認為大學不只是傳授學術知識，協助學生就業的地方，更應協助學生培養自學能力，進行全人發展，學會欣賞世界的美麗。

至於聯合的學生，余教授認為同學們都很「乖」。余教授是國際生舍堂的創舍舍監，常常在宿舍接觸到不同書院的學生，而其他書院的學生總是比聯合的

學生活潑。傳統智慧，乖巧學生總是得老師歡心，然而余教授卻認為學生太乖有隱憂。「學生太乖巧，便不會挑戰權威。只以傳統思維思考，便難以有新發明。就像我們聯合的高錕教授，如果只順應前人，覺得像前人般使用銅線便好，那末就不會發明光纖了。」因此，余教授期望能在任內提升創新的風氣，培養同學勇於挑戰權威的精神。他說：「創新不是反叛，不是反抗制度，卻要自問如何做得更好，要發掘新角度，推動社會進步。」

除了期望同學們更有創意外，余教授亦希望聯合人能給予公眾正面的印象。「社會對大學生有期望，同學要多認識社會實況，明白社會的問題和社會不平等的地方，再以知識份子的良心去研究，改善情況。對於公共事務，我們應該關心，但不要只做反對者，還要在現有基礎改善，提出正面可行，深思熟慮的看法。書院的通識課程正正為同學提供必須的基礎知識和理論，讓同學可以作出深入的思考和研究。希望同學不只是到社區機構做幾小時的義工，而是培養出貢獻社會的熱誠，發揚明德新民的精神。」

談到「三三四」學制，余教授認為新學制為書院帶來的機遇遠多於挑戰。「新學制推行後，只有三年有兩批學生，因此只是短暫的技術問題。四年的大學教育能提供更多的空間，讓學生有更充裕的時間學習和外出交流。」余教授認為香港的學生應開始意識到內地同學帶來的競爭。內地的環境競爭激烈，令內地生比香港學生表現得更積極，學習熱誠較大，亦勇於爭取出國學習的機會。反觀，香港學生甚少外出深造，他認為年輕人一直留在香港便只能認識到上一代的思想模式，這會讓香港陷入「自我繁殖」的危機。「新生代應到外地感受新思維，有學生到外地交流後，整個人都脫胎換骨，人生價值觀也有所改變。」他期望書院能幫助學生把握機會，運用新學制帶來的額外空間，到外地交流學習。

談到海外留學，原來余教授年輕時亦曾負笈美國。他於聖馬丁學院取得大學學位後，即於美國愛荷華大學修讀博士學位，隨後一直在美國中央密蘇里大學任教。談起留美的日子，余教授表示在美國的生活可說是無憂無慮，居住環境寬敞，氣氛自由，然而卻缺乏讓孩子認識中國文化的機會。為了讓三個兒子更認識



祖國，余教授最後決定捨棄美國舒適的生活，舉家遷回香港。適值中文大學正為當時新成立的环境科學課程物色教研人員，余教授便加入了中大，一直至今。余教授尚記得當年加入中大後，出席了當時的中大校長高錕教授為新教員舉辦的歡迎會，當高教授得悉余教授的研究集中於環境化學後，即表示「環境方面，太重要。」高教授曾於聯合書院創立電子工程系，並擔任創系主任。他的話除了讓余教授感到大學對新興科學十分支持外，亦造就了余教授加入聯合書院的機緣。

對於在中大的教研工作，余教授認為比美國更有成就感。「在中大能指導許多內地研究生，這些學生回到內地，對中國的發展很有貢獻，能推動社會進步。作為老師的滿足感很大，這在美國感受不到。」談到治學心得，余教授認為做研究，看法一定要與他人有所不同，要有獨特性。他常對學生說：「不要只按照別人的想法，應想想為何不這樣做，有沒有其他方法。」至於在研究過程遇到困難時，余教授認為最重要是保持樂觀，成功後喜悅會很大。「要明白研究必定有風險，遇到困難是規律。失敗讓人知道有甚麼是不可行，所以失敗是研究的捷徑，能助人省功夫。只要不斷嘗試便一定得。」

除了學術研究及教育行政的工作外，余教授亦致力貢獻其專業知識，擔任多項公職，包括水質事務諮詢委員會委員、空氣及廢物管理學會香港分會執委及香港地球之友理事等。他對公益事務的熱誠與他的成長經歷不無關係。余教授於福建出生，三歲時隨母親來港定居，而父親則長期留在菲律賓工作。余教授初來港時入讀了福建中學的小學部，受到鄉親關照，現在亦積極參與福建僑胞組織的工作。

余教授在幾年後遷到觀塘居住，入讀了基秀小學，更遇到了一位對他啟發很大的老師——曹敏敬牧師。當年還未成為牧師的曹老師是余教授在四年級時的班主任，他的諄諄教導於處世待人方面為余教授帶來不少啟迪。曹老師更鼓勵余教授申請獎學金，令余教授明白獎學金不只是財務上的資助，更是學生於成長中表現的機會。

對余教授影響深遠的老師還包括他在美國遇到的兩位良師——聖馬丁大學化學系的 Rex Widener 教授以及愛達荷大學化學系的時任系主任 Jean'ne Shreeve 教授。兩位良師在適當的時候提點了余教授，對他的幫助很大。余教授在大學四年級畢業班時，Widener 教授不只協助余教授尋找研究院，更向 Shreeve 教授引薦余教授。Shreeve 教授後來寫信邀請余教授擔任教學助理，不但學費全免，每月更能領取薪金。Shreeve 教授對余教授十分賞識，亦在余教授的學術路途上為他作出指引。當年，余教授對未來的路向尚未十分清晰，只想到若要繼續學習，便需修讀碩士課程。Shreeve 教授指導他訂立更清晰的目標，更鼓勵他想高一些。Shreeve 教授提出，若然將來會修讀博士課程，便應直攻博士，節省修讀碩士的時間，並讓研究有更大的空間。余教授聽取了她的意見，於五年內考取了博士學位。

雪泥鴻爪，雁過留聲。追憶前事，余教授表示很多人皆於人生中不經意地留下深刻的印象，當中包括了他的雙親。余教授的母親是一位十分能幹、堅強的女子，他在童年時隨母親於香港生活，自然在母親身上學習到很多。然而常居菲律賓的父親對他的影響亦

十分巨大。由於與父親聚少離多，余教授因而更珍惜與父親相處的美好時光。每當父親在家時，余教授對父親的一舉一動均十分留意。余父年輕時於上海讀書，所以閒時愛讀上海的人事，包括《大成》、《春秋》等雜誌。余教授受到父親的影響，也喜歡看這些雜誌。而余父待人處事的溫文態度亦感染了余教授。

家庭的支持對余教授十分重要。常言道：「一個成功男士的背後，總有一個聰慧的女子。」余教授背後亦有一位賢內助——余黃燕萍夫人。余夫人年青時修讀會計，後來更與余教授同往愛達荷大學深造，取得了工商管理碩士。余夫人原可馳騁商場，但為了照顧家庭，最後不惜犧牲個人事業，全職管理家庭，支持余教授的工作。對於夫人的貢獻，余教授亦十分感激，並時常與夫人一起參與書院的活動，兩位有影皆雙，令場面倍添溫馨。而自國際生舍堂成立以來，余夫人亦一直擔任舍堂的名譽女舍監，協助余教授管理舍堂，擔當着重要的互補角色。余教授更笑言很多居於舍堂的學生都喜歡與余夫人細訴心中情，在舍堂是「由我罰學生，她則『錫』學生。」

當談到公務繁忙，如何分身有術時，余教授表示只要有適當的調劑，不要只埋首於一件事，便不會感到辛苦、忙碌。因此余教授的課餘興趣十分廣泛，除了喜歡與學生、同事一起做運動外，他亦很喜歡欣賞藝術、閱讀文學。有趣的是，從事科研的余教授原來喜愛文學更勝化學。「看着一條化學方程式，我能夠理解。但是看着一首詩卻讓我更有快感。」余教授熱愛寫作，在小時候便已嶄露頭角，他所寫的文章常常被刊登於校刊。後來選讀了理工科是由於社會的風氣，以及對大自然的好奇和對機械的興趣。而文學則成為他在閒暇時的一大愛好，他更認為文學對教學工作大有助益，除可調劑心靈，更有解毒的奇效。「有些學生的文章寫得不太好，看久了容易中毒。這時閱讀文學作品，看到文字可以那麼優美，便可以解毒。」

余教授另一愛好是聆聽音樂，他的音樂愛好與教育理念可說是同出一轍。對於音樂，余教授認為並沒有好壞之分，只是聽者的心情不同，不同風格的音樂，不論是古典音樂或是流行音樂，他都喜歡。對教育的理念，余教授同樣着重包容，認為應有教無類。「每個人都有突出之處，最頑劣的學生都有天份，應給予每一位學生足夠的機會。」余教授認為中大的學生已是好學生，不須要再以成績證明自己。「GPA 只是其中一個要求，還有很多其他方面。書院亦有配合學生各種專長的多元化獎學金。」余教授的好奇心和包容心可說是其研究和教育工作的標記，也是聯合人引以為傲的共同特徵。

最後，余教授憑曲寄意，為聯合人送上捷克作曲家 Antonín Dvořák（德伏札克）於 1893 年在美國譜寫的第九交響曲 'From the New World'（《新世界》）。「這是一首活力澎湃，熱情奔放的交響曲，寫的是新紀元、新國度的新際遇。我們也是 from the new world。」大家不妨抽空細聽。

訪問及整理：周穎姿